

LIDAI MINGJIA XIEZUO JINGYAN JIESHAO

历代名家 写作经验介绍

许 树 棣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LIDAI MINGJIA XIEZUO JINGYAN JIESHAO

历代名家写作经验介绍

许树棣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LIDAI MINGJIA XIEZUO JINGYAN JIESHAO

历代名家写作经验介绍

许树棣

•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5.25印张 120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统一书号：7240·031 定价：0.85元

前 言

(一)

凡是语文工作者，尤其是经常发表文章的人，总会遇到“怎样才能写好文章”的问难。这一问难，有时发自白发苍苍的老人之口，则是出于对儿孙们写作的关怀；有时发自容光焕发的壮年之口，则是出于对子女写作的惦念；有时出于血气方刚和活泼可亲的青少年之口，则是要迫切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以求将各门功课学得更好。

能够回答这个问难的人很多。中国人可以回答，外国人也可以回答，今人可以回答，古人也可以回答，但问题相当复杂，牵涉面相当广泛。这里，只就古人的写作经验，分四方面举要说明。

第一，关于作者修养问题

应当有渊博的文化知识。“重视借鉴”就是要用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在人类所创造的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充分吸取营养的问题。任何一项壮丽事业的完成，都是在前人使用精力和血汗开创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推藏千古文化成果的功力，就不可能写出千古不磨的佳作。

应当有丰富的社会常识。“熟读活书”就是要深入到社会各阶层中去，调查一切，观察一切，熟悉世事，了解人情，关心时政，广泛学习未见诸书本的知识，用活生生的社会知识丰富自己头脑的问题；让社会现实以及美好的山光水色培养、陶冶爱憎情趣的问题。写文章不能脱离社会实际，与世隔绝的人，淡漠于人生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

应当具有各种长处。“文须兼得”就是指写文章不但要有学问即书本知识和社会知识，同时还应当具有德、才、胆、力、识、器等品质。德、才、胆、力、识、器虽有先天的差别，但又都同后天的实践有关。因此，必须加强锻炼与培养。

应当有宏伟的抱负。“文次事功”就是文章与事业相比较，文章总是次要的；立志写作的人，应当首先立志在改天换地即改造人类社会的伟大斗争中，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为人类造福是人生的第一要义，不必津津有味于文墨之间；只有在功业告成之后，才可以行诸文以传远。但是，如果自己的主张不能实现，也可以笔于书以待来者。

应当有高尚的德操。“德重于文”就是道德情操与写作技能的培养和锻炼相比，前者是首要的、第一位的。重视德育，把德育放在写作教育的首位，这是我国写作训练的优良传统之一，应当继承与发扬光大。但是又绝不能以德育的培养代替写作训练，象宋代的理学家那样把德育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

总之，要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问，要具备出众的识、器、才、力、胆，要立志于人类社会改革，要有高风亮节，这就是古代文论家对写作者在修养方面提到的应当具备的要求。

第二，关于写作要求问题

写作一定要有正确的目的。“有为而作”就不是无病呻吟。

说话一定要有依据。“言必立仪”就是讲作文、议论问题、著书立说，都要有可靠根据的。墨翟提出的“三表”说，指的就是——一切言论都必须符合古代圣王的为人行事、符合庶民百姓耳闻目睹的事实、符合国计民生的利益这三个方面，即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必须以此三者为准的。这就是墨翟及其所处时代并与之利益相同的那部分人的舆论标准。

文章一定要有中心。“文必立意”就是讲一篇文章的中心，就象一支部队的司令员一样，它是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只要立意明确而健康，什么素材都可以写得启人深思，富有教育意义。对于立意的要求，就是要“巧”、“善”、“新”、“依题”。立什么意？怎样立意？都是动笔前应当考虑的。

写文章一定要有独见。“文贵创新”就是讲写文章一定要有特色；无论内容或形式，只要新颖，有独特之处，也就有生存价值了。而创新的关键，就在于作者能致力于兼众独专，即熔铸各家各派的真知灼见和风格之长；遵守法度，即切实掌握与利用前人创造的各式各样的体式和表现手法；深入险远，即敢于攀登、敢于开拓、舍得花大力气；写出自我，即敢于正视人生、敢于吐露真情——这四点，都是写文章欲达到创新而必须努力的大方向。

写作一定要立足于现实。“不袭古人”就是讲时代是前进的，事理的发展就没有穷尽的时候，作为反映时代、阐明事理的文章，其内容就不会一成不变；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也要随之而变。前进的观点，发展的观点，也就是“走万里路”的观点，它同写文章必须“破万卷书”的观点是相辅相

成的，同等重要的；同时也是不袭古人的前提条件。

写作一定要选取自己熟悉的题材。“取材必熟”就是讲不懂不装懂，写不出不硬写。写作必须写自己最明白的道理，自己最熟悉的事物，不强不知以为知。这就可以纠正“假”、“大”、“空”的文风了。

写作一定要透视事物的本质。“书法不隐”讲的就是客观事物是怎样的，就怎样书之于简策；且能从中选取典型，抓住实质——不为现象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物质利益所诱，坚持己见，虽挫折而不移不易，头可断而不变不改。这才能为后人留下真实的记录，才无愧于后人。

这里讲的七个方面，又都可以看成是写作原则。

第三，关于文章标准问题

要能解决问题。“文必有用”就是讲写文章一定要从客观现实出发，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这是古人论文经常提到的一个原则要求。比如足以振作精神，启人向上的作品；足以反映社会现实，考察政治得失的作品；足以激励团结，互动互勉的作品；足以抒发感情，倾诉衷曲的作品；足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的作品；足以资助外交，应对诸侯的作品；足以修身立业，理家治国的作品；识高于庸众，事系于当务的作品；穷经好古，阐彰圣道的作品——都是有用的好作品。

要能以理服人。“文以理胜”就是讲写文章一定要说理正大，见地深远，足以使读者心悦诚服问题的。这既是古人写作要达到的目标，也是文章得以流传的条件。如果没有老老实实的写作态度，没有面向实际、精通经史的功力，是很难达到这一点的。

要能以情感人。“文必有情”就是讲写文章一定要有真实感受，要反映自己的真情实感，特别是文艺作品，缘情而发是它的本质特征，文艺作品就是抒情的。物生情，情生文，情愈烈而感人愈深，而文愈不朽。

辞藻优美。“言之有文”就是讲词汇丰富、多采，语言生动、形象、亲切、有趣味，这是古代评论文章的标准之一。而达到这一标准的途径，则是读经、读史、读子、读集、学好大众语、学好外来语。

以上四条，虽不是评论文章的全部标准，却从内容、形式、语言三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上提出了应当达到的目标。

第四，关于训练方法问题

学习不能躐等，写作也应当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并精心关注把习作者引上写作的正路。由简到繁是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写作也应当这样。古人对此有许多论述都很有启发性。

对于初学写作者来说，一定要广开思路，敢想敢说，不要用清规戒律约束他们；一定要引导他们说真话不说假话，说能做到的话不说大话，说实话不说空话；一定要多鼓励，不求全责备。这就叫“‘三主’训练”。而“‘三主’训练”——“以放为主”、“以写书为主”、“以圈为主”——所期待的，就是让习作者敢写、有东西写、越写越想写。

读写结合是古人总结的成功的写作经验，是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的。理有所本、体有所摹、语有所取，这就是读写结合要达到的目的。

指导者多出题目、勤指导，习作者多思考、多动笔，都是古代写作训练的经验。经常拟定一些题目，使习作者在书

本里和生活中搜集素材，叫勤指导；题目拟定之后，自己先写作，并向习作者讲心得体会，也叫勤指导。而多练的要求则是：要刻苦，要有恒，要重作旧题，要有感即作，要集中使用时间和精力。总而言之，既要充分发挥指导者的启发诱导作用，把自己在创作实践中的心得体会传下去；又要调动习作者的积极性，以求在写作实践中锻炼各种表现能力与驾驭语言的能力，这就是勤导多练要达到的目的。

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客观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只有反复修改，才能反映恰当。至于修改的具体方法，则是多种多样的。

由简到繁、“三主”训练、读写结合、勤导多练、反复修改，这虽不是古代写作训练的全部方法，但是也可于此以见概略了。

怎样才能写好文章呢？以上四个方面，共包括二十一个专题，都是从古人那里取得的值得借鉴的回答。

(二)

至于古人论文内容实质的落后性，显而易见，因而便不需要过多的批判。比如讲“言必立仪”，其立言的依据就是古圣先贤的言论和行动，包括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那么，我们目前研究社会改革，还能以《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作为主要依据吗？在当代，还有那个党会以《诗》、《书》、《易》、《礼》、《春秋》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吗？我们还可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吗？如果一个人就象孔子在《乡党》篇中所表现的，头戴“玄冠”，身穿“羔裘”，手里“执圭”，有时

“蹶蹶如也”，有时“与与如也”，有时“色勃如也”，有时“足踔如也”，有时“檐如也”，有时“翼如也”，是会惹得人们捧腹大笑的。又如古人讲“破万卷书”就是写好文章的基础之一，而要求所读的书，无非是五经与四书之类，我们还能大力提倡当代的年轻人终生一世钻到那些故纸堆里，去皓首穷经吗？不会的，也没有那样的傻子。

记得清朝有一位学问家曾经说过，著书立说有二怕，一怕显现自己的观点，二怕遗漏别人的观点。这是说，凡对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的回答，绝不能主观臆断，凭空设想；一定要广征博采先正的有关见解，虚心听取今人的有关意见；凡是有益的看法，都要竭力加以搜集、考虑、推敲，都要细心予以分析、研究，综合、概括。可见，“怕显现”并不是毫无主见，亦是亦非；“怕遗漏”并不是兼蓄并包，毫无取舍。其同代人刘开说：“夫天下有无（疑“无”字系衍文）不可达之区，即有必不能造之境；有不可一世之人，即有独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于一人之心思才力为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变而出之者也。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事实正是这样：世界上没有开辟的领域是无限的，而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集中的力量越多，开辟的领域就越大；世界上没有被发现的事理是无限的，而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因此，集中的智慧越广，发现的事理就越多。任何一种前无古人的新学说，没有不是充分吸取前人学说的成果。柳宗元自称，每次动笔，一定要以《诗》、《书》、《礼》、《春秋》、《易》为“本”，以《穀梁传》、《孟子》、《荀子》、《庄子》、《老子》、《国语》、《离骚》、《太史》作参

考，最后指出：“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指韦中立）幸观焉，择焉，有余以告焉。”凡研究与回答问题都应该是这样：以平等的态度、商量的口气，把自己的想法和认识不妨尽情而铺张地摊出来，至于对与不对，有没有可取的地方，就要让别人自行选择了；而听者与读者，也应当有所反响。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是讲，“作”是“圣人”才能干的，一般人只能“述”，不能“作”。孔子一生所干的，只是“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朱熹语）但是，孔子保存古籍的功勋是公认的，不朽的。总之，从上古的“圣人”，到中古的文章大师，再到近古的学者，他们的言论和行动，都不但给我以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使我产生了写作本书的动机；而且也为我奠定了信心，树立了勇气。

关于编著此书的取材原则：一是“不以人废言”。我不认为，凡是一有“唯心主义者”头衔的人，一辈子也没有说过一句符合客观实际的话，他们的一言一行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一点用处和实际意义；凡是一挂“唯物主义者”桂冠的人，一辈子也没有说过一句违背客观实际的话，他们的所有言论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有用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二是要有现实性和针对性。比如《文次事功》一文中某些题材的选取直至立意，就是针对那些为了获得“高级”职称，却懒于业务、玩忽职守，而躲在屋里著书立说的情况而发的；又如《书法不隐》、《三主训练》等文中某些材料的选取直至立意，就是针对胡编乱扯以及假、大、空的不良文风而来的。三是要通俗易懂。如果不得已而采用了古奥难懂的材料

料，就一定要略加解说或议论，以求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文论爱好者能够看懂。

古代文论是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瑰宝。它对写作者道德品质的要求，是适应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标准的；它所倡导的写作原则、文章标准、训练方法，从内容到形式，都为中国人喜闻乐见，都是适应汉民族的语言特点的。因此，如果批判吸取，采择其精英，以发扬光大，这对于中小学生的成长和写作能力的培养，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只可惜古文论涉及的问题驳杂、良莠难辨，内容艰深，语言古奥，就只好寄情于师范院校中文系师生、中小学教师以及语文工作者了。我写这本书，就是向他们求教的。至于我说的对不对？体会的正确不正确？“有取乎，抑其无取乎”？也诚恳而殷切地期待着“吾子幸观焉，择焉，有余以告焉”。

作者于河南省委四区家属院

一九八四年九月六日

目 录

前言	(1)
一、关于作者修养问题	(1)
重视借鉴	(1)
熟读活书	(10)
文须兼得	(16)
文次事功	(23)
德重于文	(26)
二、关于写作要求问题	(38)
有为而作	(38)
言必立仪	(43)
文必立意	(50)
文贵创新	(60)
不袭古人	(73)
取材必熟	(76)
书法不隐	(81)
三、关于文章标准问题	(86)
文必有用	(86)

文以理胜	(92)
文必有情	(102)
言之有文	(110)
四、关于训练方法问题	(115)
由简到繁	(115)
“三主”训练	(119)
读写结合	(124)
勤导多练	(136)
反复修改	(145)
后记	(154)

一、关于作者修养问题

重视借鉴

古人对于借鉴前人教训、继承前人经验的研究都很重视。

王逸《楚辞章句序》评价屈原创作的时候曾经说到：“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又说：“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可刊灭者矣。”这些话说明，屈原的著述之所以能够达到如“金”一样的形式，如“玉”一样的内容，千百年来没有可以同它相比的，且永远不可磨灭，就因他吸取了古典文献的精华，是符合“经义”的。等到屈原逝世之后，他的创作又成为“名儒博达之士”进行创作的典范，“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就是从形式、内容、语言等方面谈“借鉴”与“继承”的。以上所述，都充分体现了“借鉴”与“继承”在写作中对提高写作质量所起的重要作用。

刘勰在《辨骚》中对屈赋承前启后的借鉴作用，认识十分中肯。他指出，刘安、班固、王逸、汉宣、扬雄对屈原创作的评价都是不恰切的。他们不是“褒”得过高，就是“贬”得过低，都是“抑扬过实”的；而公允、正确的评价应当是：《离骚》赞扬尧、舜、汤、武，是吸取《尚书》的内容；它

讥讽桀、纣，哀悼羿、浇，是采录《诗经》规劝的意旨；

《涉江》、《离骚》的种种比喻，是运用《诗经》的比兴手法；《哀郢》的“每一顾而淹涕”，《九辨》里“叹君门之九重”，是《诗经》忠贞而怀怨的语言。观察这四个方面，可以说是“同于《风》、《雅》者也”。但是不可否认，屈赋也有违乎“经”意的地方，它既有“诡异之辞”，也有“谲怪之谈”，也有“狷狭之志”，也有“荒淫之意”。这四个方面，是“异乎经者也”。根据这些事实，刘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刘氏认为，以屈赋为主的这部不朽的巨著——《楚辞》，从内容到形式，既继承了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又体现了时代精神，是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的。从全面考察，它虽然低于《诗经》，却是“词赋”中的杰出者。总之，这部巨著，在刘勰看来，之所以能够“气往轶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原因，正在于“继承”与“创新”兼得。刘勰《风骨》对于借鉴、继承与创新在写作上的重要地位，也有与此相近的很好、很中肯的见解。他说：“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覃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骀繆而成经矣。”遵循经典著作的楷模写作，广泛吸取子书史书的写法为文，通达世事人情的变化，明瞭各种文章的体裁特点，这才能产生新的独到的见解，并以丰富多采的文辞作修饰。如果没有广泛的借鉴和继承，如果对于古和今一无

所知，那就不会产生什么新的主题和表达方式了。只要善于借鉴与继承前人积累的成果，熟悉各种文体的特点，深入了解世态人情的变化，就可以用奇丽的语言，将自己的创见有条不紊地予以表达。刘勰认为，如果在理论与写作技巧上忽视“借鉴”与“继承”，只醉心于追求新奇，即“跨略旧规，驰骛新作”，那就会招致“虽获巧意，危败亦多”的恶果；无根据的奇谈怪论，违背事物规律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经典的——这就叫“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刘勰的《通变》就是专门讲“借鉴”与“革新”的。他提出：文章的体裁是不变的，文章的风格是千变万化的，只要能够在文体方面“资于故实”（注意继承），在风格方面“酌于新声”（注意革新），在创作上就一定可以“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总之，写作同其它事业一样，如果没有“借鉴”与“继承”，也就没有“创新”；“借鉴”与“继承”，也就是“创新”这个婴儿的母体。这就是刘勰的认识。

唐代的许多诗文大师，在重视借鉴与继承方面，也有不少精湛的论述，很富于启发性。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只要是主题清新、语言优美之作，不讲是今人的手笔抑或是古人的手笔，一定要努力学习。凡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即精华，一定要努力学习，以它为法而积极追求；凡是不良的文风即糟粕，一定要努力扬弃，以它为戒而尽力避免。又说：“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只要是德才兼备的长者，都要学习，没有先后之分。一定要分清好坏，既不能兼收并蓄，又不要有门户之见，又要撷取百家之长。柳宗元